

# 论抗战史的书写转向

——以何铭生著《南京 1937：血战危城》为中心

杨向昆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学术研究的繁荣，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显学，相关研究成果有显著增长，所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展，视角日渐多元化。在西方学界，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受重视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最近几年，以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拉纳·米德(Rana Mitter)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高度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成果。

何铭生(Peter Harmsen)著《南京 1937：血战危城》(以下简称“《南京 1937》”)即是其中的代表作。<sup>①</sup>该书2015年在美国出版，一经出版就在西方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作者是丹麦人，曾在台湾的大学学习历史，20多年来一直在东亚担任驻外记者，先后供职于法新社等机构，1998—2009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该书以南京保卫战为主题，视阈宏阔，信息丰富，虽然面向西方读者，但对中国学界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整体史视阈下的南京保卫战

关于南京保卫战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相当成熟，内容涉及南京保卫战的宏观论述、当事人的回忆录、中英日文等各类资料整理、南京保卫战中的中日战略问题、战斗情况、双方参战部队及损失情况、战前的城防战备等问题。而何铭生著《南京 1937》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整体史的视角，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南京保卫战的整个过程。全书除前言外，共有十章。前言部分作者主要论述写作本书的宗旨。作者认为，南京保卫战虽然不像1942年的埃及阿拉曼战役、1943年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德国柏林战役那样名扬全球，但同样值得大书特书。参战双方虽然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但也有部分德国人、俄国人及美国人卷入其中，对于不少未来的交战国来说，南京保卫战算得上是一场带装的彩排<sup>②</sup>，因此南京保卫战同样具有世界影响，作者的宗旨

<sup>①</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hiladelphia: Casemate Publishers, 2015).

<sup>②</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0.

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西方历史叙述上的这一空白。

第一章“新的战斗打响了”，作者从拉贝(John Rabe)、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外国人对战争迫近的感触、战前南京城的概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中日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心态、淞沪会战后中日双方军队情况等几个方面论述古老的南京城是如何在1937年11月走向战争边缘的。第二章“全面出击”主要论述了淞沪会战期间中日双方在南京上空展开的空战，以及淞沪会战后日军整顿部队向西对中国军队展开钳形追击的情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南京是守是弃正在做着艰难的战略抉择。外交方面，中日双方却处于一种不宣而战的怪状，一边炮火连天，一边依然保持外交关系，国际上十九国会议对日本的制裁也无疾而终，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第三章“跨越战线”主要论述了日军一些中下级军官“制定出‘从嘉兴到南京’追击国军的总体纲要”<sup>①</sup>，违反了日军高层下达的停止向苏州至嘉兴一线西侧进军的命令，迅速与中国军队在吴福线<sup>②</sup>上发生激战，并最终彻底改变了日本在亚洲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并开始作迁都的准备工作，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着手设立安全区的工作，外交方面陶德曼调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第四章“太湖之战”与第五章“严冬”主要论述了日军在吴福线与锡澄线之间的作战。这其中既有战略层面描述：日军组设大本营，鹰派彻底掌握话语权，并最终制定出进攻南京的计划，又有关于太湖之战、江阴之战、广德之战、丹阳之战等战役中战斗情况、双方军队状况、后勤补给、伤员情况的描述。同时还有外交层面的介绍，苏联飞行员援助南京、日军轰炸英国军舰造成的外交冲突、仍在进行中的陶德曼调停等，以及恐惧氛围之下南京城的各方面情况。第六章“兵临城下”、第七章“决定性的日子”和第八章“沦陷”重点论述了南京城及其近郊展开的激烈战斗。战略层面，作者对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持久战略与争取苏联援助的决策以及撤退时的摇摆政策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战役层面，作者对淳化之战、紫金山之战、句容牛首山之战、光华门之战、雨花台之战、中华门之战、中山门之战、空战等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外交方面作者重点论述了陶德曼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日军轰炸美军“帕奈号”事件。第九章“恐怖”和第十章“劫后”主要论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情况，以及南京沦陷后沮丧的唐生智和前景黯淡的蒋政权以及当时中国对南京保卫战的看法。

由此可见，作者的整体史视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南京保卫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关于战争的性质，作者提出与淞沪会战防守战的性质不同，南京保卫战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战，日本对南京所展开的迅速进攻与二战中德国机械化军队所运用的闪电攻击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sup>③</sup>这个新颖的观点正是作者在对二战宏观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诸如此类，作者指出南京保卫战时期日军的闪电战、无差别轰炸和战后的大屠杀，很快在其后的欧亚战场上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其把南京保卫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考察的视点不言而喻。其二，对南京保卫战中的国际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比如在由于十九国会议的不作为导致日本侵华更加有恃无恐，陶德曼调停背后复杂的外交关系，苏联援助中国的原因以及对战局的影响等等，作者都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论述。其三，采取客观中立理性的第三方立场。在南京保卫战的研究中，中日学者都容易受到民族感情因素的影响，日本右翼甚至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而《南京1937》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作者秉持客观中立的理性立场。以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例，作者既没有采用中国普遍的30万，也没有采用日本或者西方的数字，而是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南京大屠杀的

①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85.

② 吴福线：北起长江边上的福山镇，经常熟、苏州，南至太湖边上的吴江镇，国军在此修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号称“东方兴登堡防线”。

③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0.

死亡人数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研究主题，并且看来不可能在所有人满意的情况下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当时非常清楚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清楚的是 1937 年末和 1938 年初的南京发生了独一无二的灾难性事件”。<sup>①</sup> 这种整体史的视阈既肯定了南京保卫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又为中国的抗战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借鉴。

## 二、《南京 1937》的书写风格

《南京 1937 年》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在于作者戏剧化的新闻式写作风格。首先，作者为我们呈现了多视角立体化的南京保卫战。以往的军事史著作，往往只注重对战争本身的书写，而本书既有宏观层面的高屋建瓴，又有立足于当时当地的细节描述，军事、政治、外交生动地在作者笔下交织在一起。宏观方面，中日高层对战争的构想，制定的战略，军事、政治组织的调整，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对战争的态度、采取的行动，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等等在书中都有讨论，作者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从战时的中日双方政治状况、战争过程、外交活动、南京城情况四条线索交错展现立体的南京保卫战。细节方面，具体的战斗，士兵、传教士、外交官情况等等都有非常生动的呈现，甚至援助中国的苏联飞行员都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南京保卫战前，大多数中国飞机此时都被逐出了南京上空，所以保卫南京上空的使命现在已经留给了俄国人”。<sup>②</sup> 这种书写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耳目一新、更加丰满的南京保卫战。

其次，本书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讲故事”。几乎每一章作者都是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来引入所要论述的话题，引人入胜。比如第一章，开篇作者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第二章开篇作者生动地展现了中日双方在嘉善城防御工事前的一次小战斗，读来令人如身临其境。这种写法大大增加了史学著作的可读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讲故事是建立在丰富多元的史料基础上，作者查阅了大量中文、日本、英文、德文、俄文等资料。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对中文原始档案资料的运用略显单薄，这就导致作者在诸如南京保卫战中的吴福线、锡澄线等防线以及南京城防的修筑、战前国民政府的战略防备等问题上略显语焉不详。

再次，本书运用情感史的方法，特别注重对人物心态的描写。本书对与南京保卫战有关系的各类人员都给予了足够的心态描写，对于传教士拉贝，作者写道：“拉贝自己从来没有因看到日本飞机被打下来而产生任何乐趣，尊重人命的价值，无论他属于冲突中的哪一方，这就是拉贝在危险越来越大时仍然留在南京的复杂动机中的一部分。”<sup>③</sup> 对于日军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作者写道：“松井石根和蒋介石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着一种斯巴达风格，尽管有着严厉的外表，松井也能流露感情，即使同外国人在一起，有时他也会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眼里充满泪花。”<sup>④</sup> 对于日本士兵，作者没有笼统地概括日军的形象，而是非常注重展现他们在战场上的复杂面相。作者指出，南京保卫战中的日军是“以丈夫和父亲组成的部队，他们不愿意去冒无畏的风险，做无畏的牺牲”<sup>⑤</sup>，有的士兵“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产生幻觉”。<sup>⑥</sup> 相对来说，从决策层到普通士兵，作者对日军心理的描写要比中国军队细致生动得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抗战时期日军识字率比中国军队高

<sup>①</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292.

<sup>②</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76.

<sup>③</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21.

<sup>④</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38.

<sup>⑤</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08.

<sup>⑥</sup>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09.

很多,因而留下了大量的阵中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理状态,相对来说,中国军队普通士兵能够保留下来的日记微乎其微。

另外,对南京保卫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者给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关于南京保卫战的研究虽然目前成果很多,但是有一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一,关于南京保卫战的界定问题,狭义的南京保卫战仅指南京城的七个城区、四个乡区和一个陵园区范围内的战斗,而广义的南京保卫战则指从淞沪会战结束到南京城陷落。而本书从篇章结构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后者,从广义的角度书写南京保卫战对于理解战争爆发的原因大有裨益。其二,关于苏州战役,在以往的南京保卫战研究中很少被提及,而实际上它是吴福防线上的重要据点,作者通过对比分析各种史料,指出《纽约时报》、日军发言人及松井石根日记中的错误记载,认为苏州并没有轻易被日军占领,而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才陷落。其三,关于中国在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中以牺牲士兵性命来弥补技术落后劣势的“懦夫博弈”现象作者给出了极其中肯的评价:“这么大的牺牲,却没有保住上海,同样也不能保住南京,这确实是苦涩的讽刺。”<sup>①</sup>这显示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本书虽然语言通俗,但是阅读之后会给读者带来诸多反思。比如在书中作者就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在同一天从英勇杀敌转变为残杀无辜?对此作者给出了一个理由:“日本士兵被洗脑,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虚妄的理想主义信念,即他们的使命是充当十字军,去把中国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当他们试图解放中国人的努力遭到拒绝后,普通士兵被激怒了。”<sup>②</sup>阅读本书,会有不少人疑问是否是激烈的南京保卫战导致了南京大屠杀?对此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也给出了非常中肯的观点,他认为:“大屠杀的根源是多重而复杂的,而诉诸单一的原因解释是错误的。”<sup>③</sup>几个月残酷的战争的积累效应是一个关键因素,战争初期日本官方对“通州事件”<sup>④</sup>的宣传使得“通州报仇”的战斗口号在日本官兵中非常普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原谅日军屠杀罪行的理由,只是为了便于我们理解事实的真相。总之,阅读本书,会引发我们无数关于战争、人性的反思。

### 三、抗战史的叙事转向与局限

总体来看,《南京 1937》的主要贡献在于集中国与西方等学者既有研究成果之大成,向西方学界客观地展示了南京保卫战的全貌,重新确立南京保卫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而本书带给我们最大启发则在于作者叙事主义的书写风格,带我们领略了不一样的抗战史。

其实在二战以前,叙事的书写方式长期以来就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形态,讲故事是历史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著名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曾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sup>⑤</sup>但是随着二战以来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发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分析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话语形态。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为探索历史的普遍规律,解释历史各种现象确实大有裨益,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让历史书写变得干燥无味,大众更是望而却步。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

①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28.

② Peter Harm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 175.

③ Stuart Heaver, “Nanjing 1937: Q&A with Peter Harms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017, 转引自何铭生博客, <http://www.chinaww2.com/2017/12/30/nanjing-1937-qa-with-peter-harmsen/>, 2017年12月30日。

④ 通州事件:1937年7月29日凌晨,驻扎于通州的伪冀东政府保安队突然反正,一举捣毁当地日伪机关,期间部分日本军官及日侨被杀,史称“通州事件”,通州事件被日方刻意渲染、宣传,将其作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之一。

⑤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Hayden White)对此就曾无不担忧地说：“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sup>①</sup>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抗战史研究中也特别明显。近些年来随着抗战史研究持续升温，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然而真正为大众所接受的抗战史研究著作却非常有限，大部分仅仅流传于学术界。这就导致出现了一面学术界抗战史研究日益精深和细化，一面大众对抗战史的认知仍旧非常浅显，抗战史影视剧越拍越离谱，戏说恶搞性质的抗战史读物铺天盖地，民粹主义的浪潮一浪接一浪的悖反现象。

审美和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两大功能，鉴于以上的悖反现象，抗战史研究的叙事主义书写正是未来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叙事主义书写最显著的理论取向，“就是以历史文本作为对历史学家全部工作进行理论反思的重心”。<sup>②</sup>因此抗战史叙事主义书写的第一步就是求真，要能够通过甄别过去的文本，尽可能客观中立地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并对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提出自己的解释。然而，正如荣维木所说：“稍微梳理一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史，即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求真的原则不仅没有被恪守，有时甚至被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了。”<sup>③</sup>近年来这种现象大有改观，不过鉴于抗战史料文本本身很多真伪难辨，伦理立场、政治倾向和审美偏好难以避免，抗战史研究求真依然任重道远。何铭生著《南京1937》的第三方立场，多元化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示范，不过，本书还是缺少日本学者对南京保卫战研究成果的借鉴，比如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对南京保卫战的研究等。<sup>④</sup>

在求真的基础上，叙事主义书写最重要且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就是要将杂乱的互不关联的史料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实现审美的、认知的和伦理的三个维度的统一。《南京1937》中作者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新闻式的语言使本书有了很强的美感，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建构，使本书可读性很强，同时作者也对南京保卫战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真实可信。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的抗战史研究中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当然，叙事主义书写也有自身局限性，并不是抗战史的所有问题都适合这种书写，同时叙事主义书写并非是写小说，其对史料和学者的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是“带着镣铐的跳舞”。

总之，何铭生著《南京1937》虽然尚有不足之处，但仍是一部西方学界难得的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优秀著作，在抗战史研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叙事主义书写的抗战史也未必不是抗战史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杨向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sup>①</sup>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 4.

<sup>②</sup> 彭刚：《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概说》，《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33页。

<sup>③</sup> 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的现状和有关问题》，《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第25页。

<sup>④</sup> 藤原彰『南京の日本軍——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大月書店、1997年；『中国戦線従軍記』、大月書店、2002年。